

普實克與捷克漢學發展

鄭得興

一、前言

去年（2012）我經由林蒔慧老師（政治大學斯拉夫語系）的引介而認識了台大政治系石之瑜教授，石老師向我介紹他的全球漢學研究計畫，我因而有幸參與捷克漢學研究這部分。石老師提供我約十份對捷克資深漢學家的訪談稿，於是我開始蒐集及閱讀捷克漢學相關的書籍及資料，並在今年暑假前往捷克及斯洛伐克拜會了其中幾位漢學家。他們大都是捷克漢學家普實克（Jaroslav Prusek, 1906-1980）的學生，並在1950年代前往中國求學或擔任外交官員。今年11月在台北召開捷克、波蘭、蒙古及俄國的漢學研究會議，這是石老師研究計畫的成果發表會，我除了分享與會者的研究心得之外，並在會後參與對捷克漢學家羅然（Olga Lomova）老師的訪談，期間我才對心中一直以來的疑惑有了解答。我2002年到捷克布拉格讀書，當時對於捷克查理大學內竟設有蔣經國基金會歐洲總部存有好奇心。根據此次在台北與羅老師訪談的說法，她認為蔣經國基金會歐洲總部設在捷克查理大學，其中一個原因是希望藉由基金會的設立而復興在普實克帶領下的布拉格漢學傳統。

我在布拉格求學期間（2002-2009），經常參加羅然老師藉由蔣經國基金會舉辦的研習營或國際會議，藉此學習機會經常與來自歐洲其他國家

的中文系學生共同聆聽有關漢學的課程，並在國際會議上吸收各國漢學家的最新研究報告。2013年11月15日我應捷克查理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系之邀，在布拉格查理大學發表文章，恰巧同一地點的不同會議廳正舉辦由羅然老師舉辦的國際漢學學術會議，我於11月16日早上參與了半天的會議，聆聽王德威教授及大陸蘇州大學季進老師對普實克的研究報告，讓我更進一步了解捷克的漢學研究傳承。在這場會議中，羅然老師特別邀請了普實克的學生何德佳（Věna Hrdlicková，八十多歲）作為會議貴賓，我在暑假期間也曾至何德佳女士家拜訪，因此在會議上我們算是「舊識」了，我們在休息時間有短暫交談。羅然老師在台北接受訪問時表示，普實克及他的學生們是用畢生生命奉獻在漢學上，我完全同意，他們在歷經這麼多政治風暴上，布拉格之春運動之後，他們有許多都被迫離開漢學工作崗位，包括普實克，但他們幾乎沒有人放棄對漢學的熱愛及寫作。當我訪問這些捷克的資深漢學家，他們的精神很快就感染我的心緒。我在暑假期間造訪這些漢學家，我看到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迷戀，他們有豐富的中國文化蒐藏品（書、畫、裝飾品及他們本身的作品），我們以中文交談，他們引領我回到1950年代在中國生活的記憶。

普實克不僅是捷克漢學的重要文化遺產，更屬世界級的漢學大師，尤其他與他的學生們所形

成漢學研究成果，更是形成了捷克的重要漢學傳統，有人稱之為「布拉格漢學學派」。他們在 50 年代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交流中，派遣了優秀的年輕漢學家前往北京求學，其中有些在捷克駐北京的大使館擔任文化參贊。捷克斯洛伐克原本對中國人民而言是陌生的，然而社會主義革命之後，捷克人民與中國人民似乎很快就變成得最親密的戰友。他們互相派遣學生，中國 50 年代也選送留學生前往捷克求學，後來他們學成歸國後，發展也相當不錯，有些人成為重要的波西米亞專家。普實克在 50 年代的中國與捷克雙邊文化關係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透過他的影響力，他曾經率領文化團體訪問中國，他的學生到中國學習漢學，後來在 60 年代的國際漢學界上表現亮眼。50 年代共產中國建立後，非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都逐漸離開中國，能進入中國留學的大都屬於社會主義陣營，因此國際漢學界中 50 年代的社會主義國家學生在中國的學習經驗，成為相當特殊的一群。不過正當捷克漢學正逐步發展之際，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運動卻使捷克漢學發展中斷，一直到 1989 年民主化之後，捷克的漢學發展才又回到正常的路線。本文將探討普實克及

他的學生在社會主義的世界中，如何展開漢學的發展。

二、普實克與中國的關係

捷克布拉格漢學學派的 Prusek 奠基人普實克（1906-1980）第一次去中國時間是在 1932 年，主要目的是進行學術考察，他原計畫研究中國經濟史，但實際接觸中國社會之後，他的研究興趣轉移到中國人民的社會生活、風土人情和民間藝術。普實克在中國停留至 1937 年，期間他也應日本政府邀請去日本進行考察，不過普實克仍比較同情中國，而譴責日本的侵略暴行。在中國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他結識茅盾、冰心、丁玲、郭沫若、沈從文、鄭振鐸等人，並與魯迅書信往返，1937 年回捷克之後即著手翻譯「吶喊」，並同年出版。普實克在中國停留期間，根據他的考察觀感及研究成果，寫成了「中國—我的姐妹」一書，並在 1940 年出版，此書「喚起眾多捷克青年對中國的興趣和對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的熱愛，從而導引他們獻身漢學研究」（《中國—我的姐妹》，普實克著，2005:2）。



圖1：筆者與烏金老師



圖2：筆者與白立德老師

1956年9月中國人民日報記者李延寧一行人，來到布拉格東方研究所採訪普實克，他們的採訪紀錄刊登在1956年10月4日的人民日報，他們讚揚普實克的著作豐富，其中有關漢學的部分舉例就包括《論中國文學與文化》、《中國人民文學》、《中國的文學與教育》、《新中國文學》、《毛澤東主席和中國文學》、《解放後的文學及其人民傳統》等。此外，普實克「還以極大的熱情歌頌中國革命，介紹新中國。從1932年起，他就以『巴塔克』的筆名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黨刊『創造者』上寫了許多篇介紹中國革命、中國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通訊和文章。1935年他寫過中國紅軍的前進」，「在新中國成立以後，他以更大的熱情來介紹和歌頌新中國。1949年他出版了『為自由而戰鬥的中國人民』，並且親自又把它譯成斯洛伐克文。這一本書現在已被譯成波蘭文和匈牙利文」（《人民日報》，李延寧，1956.10.4）。



圖3：何德佳老師

普實克1928年畢業於布拉格查理大學，他的青年求學階段是捷克斯洛伐克在第一民主共和時期，他於1932年至1937年在中國停留期間亦是中國國民政府所謂的十年黃金建設時期，有關普實克在漢學研究之外的政治意識形態觀比較少被提及，不過根據他的實際作為，包括在中國結識的對象，以及政治文章的寫作等，他與50年代以前，或甚至60年代以前的中國社會主義及捷克斯洛伐克的共產政權似乎具有某程度的親近性。也似乎由於普實克的政治態度或政治意識形態觀，而獲得中國與捷克斯洛伐克共產政權的支持，以致成為影響布拉格漢學學派奠基的外部因素。

普實克去過中國三次，除了1932年至1937年去中國進行學術考察之外，他第二次即以捷克斯洛伐克文化代表訪華團團長的身分，於1950年12月10日至1951年2月23日前往北京、上海、杭州、廣州、武漢等地訪問，這次訪華行程長達二個多月，拜會許多政界、學界及社會各界人士，亦參觀工廠、學校、圖書館、博物館、托兒所等，及欣賞京劇及新歌劇表演。普實克此次行程在中國的各報紙都有相關的報導，以《人民日報》為例，1950.12.12、12.14、12.18、12.22、1951.1.3、2.16、2.24、1951.3.29等都有相當篇幅紀錄普實克訪問團的行程，顯見中國政府對普實克代表團的重視。普實克第二次訪問中國的行程中，有一項重要的工作，亦即購買書籍，捷克東方研究所於1952年成立「魯迅圖書館」（郭沫若題字），成為當時中歐地區最大的中文圖書館。魯迅圖書館的成立與普實克不遺餘力的蒐購中國圖書有關，30年代他回國時即為東方研究所帶回了許多中國典籍。「但是，在資本主義時期的捷克斯洛伐克，真正的中文圖書館是無法建立起來的。直到工農政府成立後，捷克斯洛伐克漢學家們的願

望才有可能實現。我國政府贈送他們一批中國書籍做為中國人民的禮物。為了滿足捷人民對中國的日益增長的興趣，在捷克漢學家的努力和捷政府的充分支持下，這個中文圖書館終於在布拉格誕生了」（《人民日報》，1957.3.12）。人民日報（1952.11.3、1957.3.12）與《文匯報》（1959.3.29）對捷克魯迅圖書館有些相關報導。

本文先引用中國官方報紙來追蹤普實克與中國的關係，目的是想導引出筆者的主要研究問題，亦即布拉格學派成立的外部要素—1950年代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對中國社會主義的認同。筆者提出一個可能的研究問題，亦即若無1950年代的社會主義中國，即無1960年代的布拉格漢學學派。1959年3月29日的文匯報有一篇報導捷漢學研究工作蓬勃發展，大量出版介紹中國的書籍和中國作品，其中有一段寫著「捷克斯洛伐克的漢學家們十分注意研究中國大躍進的情況。他們經常舉行有關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政治、經濟發展情況的各種專題討論，邀請曾經訪問過中國的人作有關中國人民公社全民煉鋼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報告。他們對大躍進中，中國勞動人民創造的大量詩歌特別感到興趣，有些漢學家研究工作者已準備翻譯這些詩歌」（《文匯報》，1959.3.29）。當然，中國官方報紙充滿意識形態的語言。然而，除了政治意識形態提供布拉格漢學學派建立的外部支持要素之外，捷克漢學家的研究如何能不與當時的社會意識形態形成某程度的結合呢？尤其布拉格漢學學派的重要內涵之一即為中國現代文學的探討，儘管許多中國30、40年代的左翼作家進入新中國之後，創作量急遽萎縮，但對中國現實社會的關懷透過其中國作家早期作品理應有其延續性，亦即對中國現代性的關懷應與當時社會意識形態有所關連。

1956年9月28日普實克擔任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代表團訪問中國，時間長達一個多月（1956.9.28-11.8），期間二國科學院簽訂了合作協議。這是普實克第三次前往中國（《人民日報》，1956.9.29、10.19、10.22、11.8）。除了他身體健康因素之外，中國與捷克的政治環境於1960年代產生了變化，中蘇交惡、中國文化大革命與捷克布拉格之春運動等因素，捷克年輕的漢學家在1950年代雖在中國學習，並在回國之後從事漢學研究，儘管其漢學研究成果能被國際漢學界肯定，但他們大多數再也沒機會回到中國去，直到1980年代雙方關係好轉。然而，1950年代捷克年輕漢學家在中國的學習經驗，仍是大多數西方漢學家及有意從事漢學研究的年輕學子所羨慕的對象。布拉格漢學學派的奠基主要得利於普實克的個人貢獻及外部政治因素。

三、我拜訪的捷克漢學家

普實克在1939年德國納粹佔領捷克期間，號召了一些捷克學生學習中文，普實克相當重視栽培年輕的漢學家，二次戰後捷克查理大學成立的中文系，普實克任教於此，並在50年代初選派他的學生送往中國去學習。我利用暑假期間前往捷克拜訪其中的一些資深漢學家，首先拜會的對象是烏金老師（Cerna Zlata），烏金對漢學產生興趣主要是緣起於小時候曾看過中國畫展，對中國繪畫產生濃厚的興趣，不過進入社會主義時期的捷克，烏金因為家庭背景因素本來無法上大學，後來雖然克服了困難進入大學學習中文，但卻不能出國，直到1950年代末她才有機會到北京工作。烏金對中國民間工藝品有特別嗜好，我去他家拜訪，深刻感受她家簡直就是一座小型的中國藝術博物館，她對時下的民間工藝品大都是大量的機

器製造，很不以為然，她堅持盡力蒐集真實的中國傳統民間工藝品，並協助捷克博物館定期舉辦有關中國民間藝術品的展覽。

我再透過烏金老師的協助安排，接著拜訪了普實克重要的學生白立德（Gustin Palat），他年事已高（90歲），老年孤單，身體也不好，目前臥榻在療養院中，必須透過院中護士的協助才能方便行動。他的寢室中仍存放著許多有關漢學的書籍，其中包括他的著作。共產中國建立之後，白立德隨即派往捷克駐中國大使館擔任文化參事一職。他在職期間，曾經遊歷中國許多地方，其中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認識西藏的達賴喇嘛，我們一起分享他在中國遊歷的照片，他英俊挺拔，很難想像照片中的白立德與目前老年寄居療養院的情況相比，不勝唏噓。接著，我拜訪了另一位漢學家Hermanova，她在共產政權的正常化時期（1970年之後），參與了中捷大字典的編撰，此外她曾翻譯西遊記，捷克文稱為猴子王，銷路似乎不錯。我去她家參訪時，她正與她

先生一起打包藏書，準備捐贈至保加利亞的大學圖書館蒐藏，並希望在巴爾幹國家傳承漢學的傳統。

之後，我拜訪了何德佳（Vena Hrdlickova）女士，她先生在1950年代接任白立德的文化參事一職，不過不像普實克遊歷中國各處，他們夫婦在捷克駐中國大使館中行事風格比較謹慎。白立德在結束中國外交生涯後，隨即前往日本擔任外交官員，因此他們不僅是漢學家，也精通日語及日本文化。何德佳老師的家中有一塊滿清末年中國地圖的地毯，感覺這塊地毯應該相當珍貴，她卻將之放在地板上，不過讓人有種踏在中國土地上的感覺，這可能也是何德佳老師與中國經常連結的最直接方式。之後，我拜訪捷克重要的藏學家Kolmas，他精通藏語，並且與達賴喇嘛稱兄道弟。他的著作相當豐富，曾經擔任過捷克東方研究所的主任，他相當留心蒐集藏學及佛學的經典書籍。此外，透過羅然老師的安排，我坐車前往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迪斯拉瓦，拜訪高利克



圖4：筆者與Zdenka Hermanova老師

(Marian Galik) 先生，他曾於 1950 年代末前往北京大學學習二年，他著作相當豐富，至今仍在學術界相當活躍。他主要研究茅盾及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我去拜訪高立克二次，他提供我研究捷克漢學發展的一些線索資料。最後拜訪的對象是 Drinek 先生，他早期在捷克南部的 Zlin 城市中的 Bata 鞋廠工作，因為公司想發展中國業務，而派 Drinek 去學習中文，他在 1950 年代到了中國北京國際關係學院就讀，並獲得學位。之後，他長期擔任捷克駐中國大使館的外交官員，他的政治態度相當明確，至今他仍堅持中國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相當擁護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

我在今年（2013）暑假期間拜訪了以上七位捷克的資深漢學家，除了 Drinek 之外，我大部分都是去他們家中拜訪，我看到了他們家中具有濃厚的中國味，他們蒐藏了不少有關中國的畫作、茶具、書籍、紀念品等，許多蒐藏品看起來價值不小，尤其是特定人士的饋贈，包括齊白石的畫作或者郭沫若的禮物等。另外，他們的藏書相當豐富，其中也包括他們的翻譯作品及著作。他們大多著作相當豐富，少則六、七百筆著作，甚至多達九百多筆著作，包括翻譯、專書、文章、評論等。讓我感受最深刻的是，他們對漢學的熱誠態度是一種生命方式的體現，他們是漢學界的一段傳奇。

四、結論

國際漢學界對捷克漢學家普實克大多是推崇有加，他對捷克漢學的發展奠立堅實的基礎，他以個人的學習熱情感召了他的學生，因此捷克年輕漢學家在中國學習漢學無不效法普實克的學習方式，包括對現代文學的關注、認識中國當代文

學作家、透過社會遊歷的方式體驗社會現實感等。1950 年代普實克的學生在中國的學習經驗是相當珍貴的，因為相對於其他西方國家的漢學家，無法進入中國學習，捷克年輕漢學家掌握機會在中國學習，並在普實克的指導下，許多捷克年輕漢學家都能在國際漢學界有重要表現的機會。

捷克漢學的發展與普實克個人因素具有相當緊密的連結，1950 年代末中國與蘇聯逐漸交惡之後，捷克因追隨蘇聯的決定，而不再派遣留學生前往中國學習。此外，1968 年布拉格之春運動以及隨後的正常化運動迫使普實克必須離開其漢學的相關工作，普實克的學生大多也追隨他之後，離開了主要的漢學工作崗位，雖然普實克在往後的人生歲月裡因政治因素，而被迫離開她最鍾愛的漢學工作，不過捷克的漢學家們並未因此挫折，而停止對漢學的熱愛及研究，他們仍設法寫作及向外發表，因此在 1989 年捷克民主化之後，捷克的漢學發展又恢復正常，並連結普實克對漢學研究的重要遺產之上。

羅然老師在台北接受訪問時表示她沒辦法像這些捷克資深漢學家一樣，以全生命的熱誠投入在漢學的研究之上，她認為自己做漢學研究還是比較具有理性思維，但普實克及其學生們所譜寫的捷克漢學發展史正是一段捷克漢學發展的傳奇，我有幸能接觸捷克布拉格學派的重要漢學家，我進了他們家中感受他們漢學世界的建構以及他們對漢學研究的那股精神，我與他們分享了 1950 年代他們在中國求學的照片與經驗，這已對我產生不小的震撼，他們還有好幾位目前在學術界仍持續研究及發表，他們並不想在這塊漢學耕地上片刻歇息。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